

●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社区关系重建和生活意义重塑

——行动研究在村改居社区工作的运用

杨 静

(中华女子学院 性别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地区发展模式主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归属感、认同感等)问题,而行动研究方法,则提供了一个实现社区意识建立和生活意义重塑的方法。本文通过北京某村改居社区工作案例,来展现行动研究方法应用于社区意识形成和生活意义重塑的过程。通过建立社区学苑,以社区教育为核心,以开设的系列课程作为联络、建立和深化群众关系的手段,达到居民社区意识形成和重塑生活意义的目的。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 社区工作 地区发展模式 行动研究 改变

[作者简介]杨静,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朝阳区近邻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1-0008-08

一、村改居 社区工作的背景

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以2000年为基准)的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城市化水平要达到55%。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据初步测算,北京市未来将在中心城、中心城外围以及11个远郊新城规划范围内列入900多个行政村,约85万农民将转成市民。

就北京市朝阳区来说,截止2012年底,朝阳区农村城市化综合实现程度达到96.7%,居全市各郊区县之首。自2003年以来,朝阳区孙河乡,由于城市绿化占地、机场南线修建、别墅区开发,

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的政府大规模土地储备等,使孙河乡15个行政村的9个村陆续拆迁,农民上楼,逐渐形成2万人居住的农改居新社区——康营社区。2009年,康营社区正式组建第一个社区居

使用村改居,而非农转居,是因为其性质属于“农转非”,即从农民转成城市居住的方式,但身份依旧是农民。

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网,强国论坛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7548561>.

商务部公共信息服务部新农村网 http://nc.mofom.gov.cn/article/xw/dsxw/201203/18244875_1.html.

委会,在康营社区实行城市居委会的管理模式。

由于村改居,居委会的成员绝大多数由原来拆迁村的村干部组建而成。他们缺乏城市居委会工作的经验。因此,在朝阳区农委的引荐下,北京朝阳区近邻社会服务中心进驻该社区,协助刚成立的第一个康营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

二、行动研究指导下的社区分析

进行社区分析是开展社区工作的前提,也是必要的程序和步骤。比较流行的社区调查一般都会采用借助居委会的关系进入社区进行问卷调查或者入户调查。但我们摒弃了这一做法,进而采用了行动研究的方法。行动研究主要是为了改善实务工作者在实践中的问题,是一种为自己的专业实践而服务的研究,行动研究特别强调在实践中找到研究问题、研究者的位置与研究对象的合作信任关系、分析资料要持续地反观照镜而常见行动研究螺旋之特征。它的理念和方法更适合我们对该社区的了解和认识。

(一) 行动研究的核心主张——了解与改变的辩证关系

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改变,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产生至今,发展为三个主要的派别,即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以及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行动研究的创始人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在其《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辨识和指认了“了解与改变”这一辩证相生的逻辑是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的行动逻辑。舍恩认为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一事,必须投入到改变该事之中。但改变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它。“了解与改变”的辩证关系道出了行动研究的核心思想。

“从改变中了解,在了解中改变”是我们在该社区中所遵循的工作策略,对社区的了解和分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方法是:边服务边调查,通过服务进入社区居民的生活世界,并与他们的生活世界建立联系。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遵循资产为本的社区工作理念,即不能只看到社区中存在什么问题,更要看到社区中已有的优势和资源(人的擅长、性格、可以利用和开发

的资源、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如我们抓住了群众生活中最关心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举办夏令营(小学生)、亲子班课程(每周五天,让1—3岁之间的孩子和家长一起上课)以及为家长开设家庭经验工作坊(育儿知识、家庭如何塑造人、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等)课程,通过服务得到了家长们的信任,自然地进入其家庭深入了解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状况;通过集体的文娱活动(恢复了社区秧歌舞、广场舞),带动社区中最广泛的人群参与活动,进而与这些居民更为熟络。通过建立社区学苑,开办合唱班、京剧班、书法绘画摄影等课程,与社区群众建立了较深厚的人脉关系。随着社区关系的深入,我们循着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而走进家庭,开了无数个工作课程团队的讨论会,从中了解居民的想法和需求。我们在服务于群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收集群众的反馈。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地,形成了一幅社区的基本图像,定位了社区工作方向。国

2007年建立,2010年正式注册为民非。由杨静老师创办,最早在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善各庄村开展农民工社区的服务,201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各村被拆迁,该组织因为其服务得到了朝阳区农委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引荐到康营社区。

李易骏:《当代社区工作》,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03页。

陶藩瀛:《行动研究:一种增强权能的助人工作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3页。

蔡清田:《教育行动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林素卿:《教师行动研究导论》,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潘世尊:《教育行动研究——理论、实践与反省》,台湾心理出版社2005年版,三位都将行动研究进行了归类。本文的意图不在于介绍行动研究,而是使用台湾夏林清教授推动的行动研究。

Donald A. Schon, 夏林清译:《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夏林清:《一盏够用的灯:辨识发现的路径》,《应用心理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52页。

Dennis Saleebey:《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杜立捷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杨静:《针对农民上楼新建社区的调查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行在路上——变迁与发展中的社区工作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320页。社区分析的资料基本上来源于该调查报告。

外的社区工作经验也显示,入户调查和问卷也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他们也提倡调查从参与社区活动和服务社区人群开始。

(二) 社区的优劣势分析

1. 社区人口分析

截至2012年年底,该社区已经居住了将近1万左右人口。有本地农民、外来人口、城市居民等。职业类型有各种服务人员,如销售、教师、警察、保洁、司机;社区中有农民身份的大量的中壮年人没有固定的工作,50岁以上的男女基本上闲置在家,老年妇女们带孙子、做饭成为其主要的工作,男性则无所事事。也正是由于大量人员闲置在家中,他们就成了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力军。目前绝大多数的居民衣食无忧,他们很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娱乐。这也为我们组织这类活动提供了工作基础。

2. 社区公共设施分析

该社区周围缺乏公共生活设施。至今没有开办幼儿园,没有中小学,没有大型超市和规范的农贸市场等;缺少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又由于出行和生活不便,相对的社区服务中心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滞留场所。

3. 社区关系分析

该社区由原来的村落拆迁组成,打乱了原有的邻里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疏,对新的社区没有认同和归属感。由于行政村仍保留着集体经济股份制,所以原来的村民对本村仍有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村委会和居委会并存,康营社区的概念很难形成,加上居委会经验不足等,对社区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

社区居民仍沿用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生活。尽管不住在一个楼或者一个社区,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在,亲戚、家人和朋友们都住在附近,人与人之间仍旧有紧密的联系。熟人关系是我们展开社区工作的优势,口耳相传,借助一人就能联系到一群人。但是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复杂,也导致我们不清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村落之间的恩恩怨怨,很多工作也会陷入一些莫名的僵局。如一个大姐不来参加活动,其他的人也跟着不来,了解得知,大家是亲密的姐妹和亲

戚等。

4. 村改居生活适应分析

村改居容易,但很难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他们的身体上楼了,但思想意识却仍旧停留在原来的农居文化的意识里。身上带有原来的生活习性,习惯串门和街头巷尾的聊天,住在封闭的楼里有一种憋屈感,尤其到了夏天,大家都在楼下三五成堆聊天打麻将,这不是老城区的居民小区能见到的景象。冬天的楼道里仍旧放着腌咸菜的缸和坛子,堆放着杂物,街上晾晒着从农村亲戚家拿来的玉米,拔了院子里的花草种菜等。

当老百姓过了住干净的新房子的欣喜感和数钞票的新鲜感之后,开始无所事事。缺乏有趣的社区集体生活,以及日益上涨的物价水平所带来的恐慌感等,慢慢地在他们中间酝酿着一种生活没有意义的消极情绪。村改居的生活方式和之前的农居生活的对比感也就越来越强烈,让居民们慢慢地对原来的生活开始怀念,对曾经讨厌过的生活越发地赋予一种意义。有个大爷说,“现在就是吃饱了盼天黑,天黑盼天亮,活着没有奔头了。之前,养个小鸡,看着长大,下蛋,都觉得是一个乐趣”。可见,“意义不是出现在我们意识流之内的某些经验内在地具有的性质,而是从眼前当下,以反省的态度看去,是对过去经验作解释所得的结果。当我在回顾中把他们把握为对过去所做事物的清楚经验,他们才会有意义”。

5. 社区历史及传统文化分析

孙河乡是一个文化大乡,他们有历史上引以为自傲的小车会、高跷、秧歌、京剧等文娱形式,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传承。这些在上楼后如何保护和传承,成为他们可以持久回忆的乡

Twelvetreets, Alan(2002). Community Work(3th.), New York: Palgrave.

如果读者详细了解该社区的情况,请参看杨静:《针对农民上楼新建社区的调查以及未来工作计划》,《行在路上——变迁和发展中的社区工作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320页。本章涉及其中的一部分社区调查情况。

李芳英:《赋行动以意义》,《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2期。

土情,也是我们在连接其生活意义的时候需要加以整理和利用的。

三、行动研究指导下的社区发展

(一) 通过地区发展模式重建社区意识和生活意义

地区发展模式针对的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日渐疏离的社区关系、社区凝聚力解体、居民的冷漠无助、社区内欠缺民主参与等问题;它关心人在现代社会中失去尊严,没有归属感,而且也不能用民主来解决问题的情形;强调要从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当地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联合政府,改善社区环境,从而达到居民自助、互助的目的。强调居民的参与、合作,集体组织起来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福利需求,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从上述的分析中看到,康营社区所面对的问题,正是专业社区工作中地区发展模式所针对的问题。康营社区的居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村改居,不仅存在社区硬件设施重建问题,更存在重建社区意识以及社区人际关系、重新调整家庭利益关系、重组新的利益格局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意义重塑等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制定了针对该社区的干预目标:

1. 重建社区关系,建立社区意识

社区意识是指居住于某一地区的人,对这个地区及其邻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认同与融合,即所谓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亦即人们认为这个社区是属于他的,而他也属于这个社区,又称之为社区情谊(community feeling) 这种意识是社区建设的原动力和社区发展的基石及社区行动的基础。在社区意识的基础以及社区居民与社区意识的结合互动中,形成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事务和环境的共同认识,进而成为对社区人、事、物的认识及参与行动的基础。社区意识可以分为四个概念:熟悉感、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笔者认为,这不仅是社区意识的四个概念,更是四个培养意识由浅入深的层次。

2. 重塑村改居后日常生活的意义

重塑该社区群众的生活意义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和任务。一方面我们为该村改居的社区赋予一种生活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对社会工作者在这个社区里的行动赋予意义。对社区来说,我们从如下方面赋予意义:

(1) 用整理过去文化的方式,让社区居民对传统农耕文化中优良的部分重新回忆,唤起乡土情;

(2) 重塑村改居的生活意义。这里的意义重塑,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因为个人都对其生活赋予一种意义,如看孩子、做饭、参加绘画唱歌等都是一中生活的意义。而且同等重要的是与上述社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意义,即在参与、付出、团结、协作之后得到的集体生活意义。

(二) 把行动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社区工作策略
提出行动研究即“关系、空间和机会”三者的辩证关系的,是台湾行动研究学会创会理事夏林清教授,在其3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坚持批判解放取向的行动研究,将关心社会正义和公平

甘炳光、梁祖彬等:《社区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33-34页。

徐震:《论社区意识与社区发展》,《社会建设》1995年第90期,第4-12页。

黄富顺:《加强社区意识,建立祥和社会的途径》,《社会发展季刊》1995年第1期,第23-33页。

李易俊:《社区意识》,载《当代社区工作》,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4页。

2011年,应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朱健刚老师邀请,夏林清教授在四川灾后经验整理工作坊中,提出了此概念。本文作者当时也应朱健刚和夏林清老师的邀请参与其中,将此概念加以整理,并得到夏林清教授对此理解的确认。这样明确的概念目前没有在夏林清教授的文章中出现。

台湾夏林清老师是将其导师、美国行动研究大师Donald Schön所著的《反映性实践——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Chris Argyris的《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华语世界,对行动研究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推动贡献的人。其在台湾所推动的行动研究,在继承了导师Schön和Argyris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转承勒温(K. Lewin)和杜威(J. Dewey)并呼应批判理论学派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理脉,应对台湾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的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丰富了实践取向和批判解放的取向的行动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实践路径。

作为改变的目标,并将行动研究理论加以丰富和发展而提出的。她认为通过反映对话,在变动的关系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实践者与实践场域的人、教师与学生等等),看清“彼此复杂情景脉络和社会关系”而达到彼此的深刻理解,建立人与人之间有承载力的厚重的关系。当彼此看清的时候,空间才被拉开,改变的机会才被看到或创造出来,进而促成改变。我们也尝试将此应用于该社区工作中。在重建社区关系和重塑生活意义的过程中,细致对待关系,拉开人与问题、情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创造出改变的机会。

在行动研究中,外来的社区工作者主要的角色是协同探究者或者称之为协助者,而非主导者。即社区居民永远是社区的主体,在开始阶段我们可能发挥着教育者、组织者、资源联络者作用,甚至可能在某一段时间是主导者,但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切记地区发展模式所强调的社区意识培养,或者行动研究方法强调协同作用,最终社区意识的整体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社区骨干发挥作用等才是社区发展和行动研究的理念和目标。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采取了如下工作手段:

1. 从解决他们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入手,与之建立熟悉感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认同感,如我们从亲子班介入,抓住群众望子成龙的心态,进入家庭;

2. 用普遍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和群众建立熟悉的关系;

3. 建立社区学苑,作为建立深入的关系的平台,从中发现骨干和培养骨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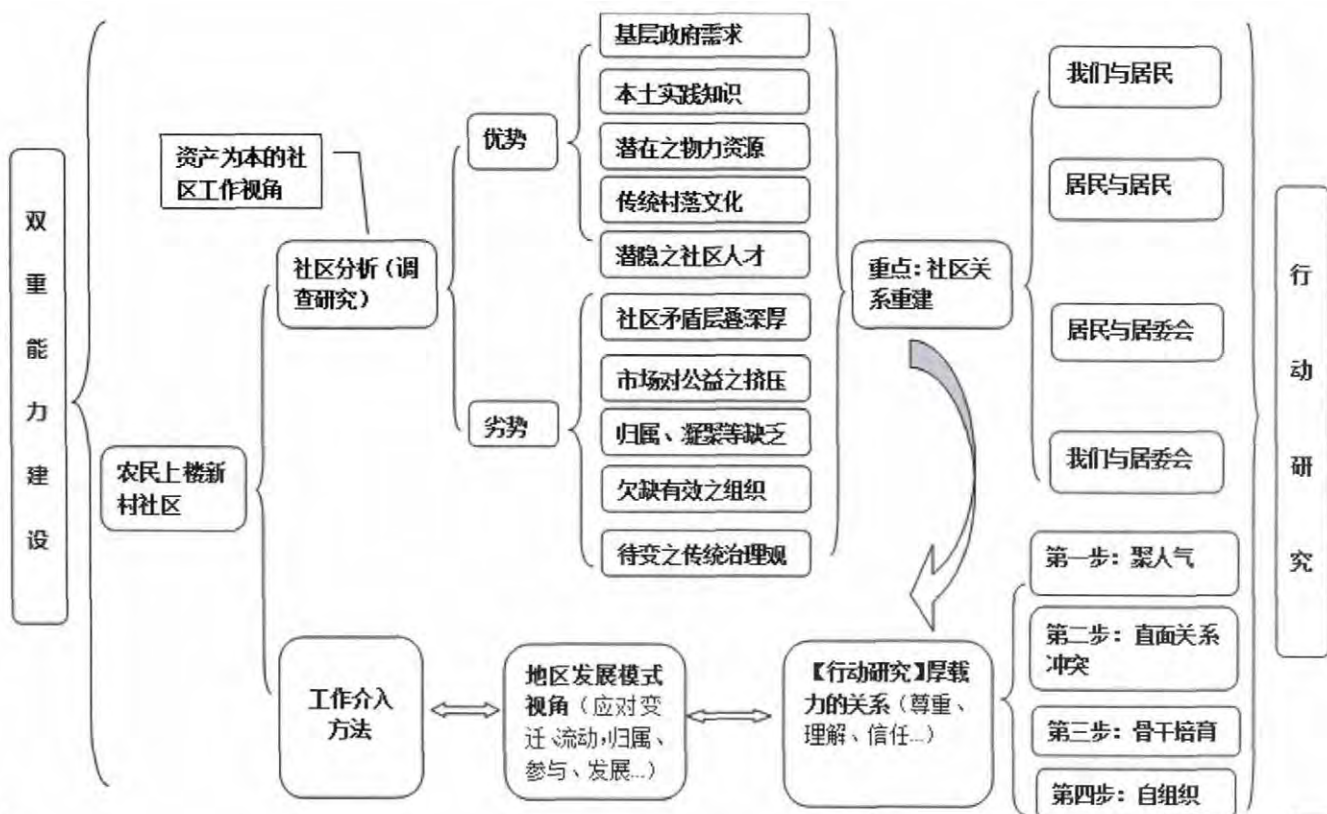
4. 通过组织社区大型公益活动,使得社区骨干有一个参与公益活动的平台,进而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利用此种空间,创造人们意识和观念发生转变的机会。

下面,我们具体说明上述工作手段如何体现出夏林清老师提出的“关系、空间和机会”的行动研究策略。

四、以关系建设为基础,通过拉开空间创造社区改变的机会

为了达到社区关系重建和生活意义重塑的目标,我们使用行动研究中建立关系、拉开空间,寻找改变的机会的方法,展开了社区工作。

工作的示意图:



(一) 建立社区学苑,营造物理空间,连接社会关系

我们借鉴台湾社区大学 的经验,在康营社区建立了社区学苑。创建社区学苑,我们不仅提供了居民一个物理空间,同时持续的课程活动让我们为居民之间关系厚度建立以及我们和居民之间关系的建立都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在社会学里,将公共空间分为三种,第一是物理空间,第二重是精神空间,第三重是社会历史空间。笔者认为,在夏林清教授推动的行动研究中,空间概念还包括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空间,以及人将自己复杂的褶皱、一团乱麻似的经验情绪拉开、梳理清楚而展开的那个空间。

社区学苑的建立,为居民提供了双重的空间,即一个活动场地(物理空间),各种课程以及社区各种活动空间(精神空间),让居民在工作场域、家庭、学校之外有一个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在社区里开展社区工作或者建立社区组织也发挥着空间的作用。让人们在面对情感纠结、关系挤压的家庭以及工作场域的紧张、压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这些张力纾解的空间(当然休闲娱乐场所等等都是一种纾解压力的空间,但这不是笔者要关注的空间)。我们开设的京剧课,各种书法绘画摄影班,手工艺、健康常识讲座,亲子班和家庭经验工作坊等,尤其是暑期夏令营,聘请香港的社区音乐人和民众戏剧的老师为孩子们在家和学校之间拉开一个空间,在目前注重分数的教育体制下,创造出自由唱出自己的心声、发挥自由想象的绘画空间等,用游戏活动等带出协作和团结等这些在独生子女教育中日渐淡化的品质。在这些活动中,居民之间的关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空间里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孙河的小车会、高跷的历史通过访谈老人——社区收藏这些文化的人,加以整理,用展板的形式变成历史文化的展览,这不仅是创建历史文化的空间,也是生活意义的一种重塑。

第二层空间的创造,是指在关系中,即一个人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拉开的空间。

当我们通过第一层的空间,将社区居民聚集在以社区学苑为平台的课程中,课程的持续性(每周半天)、人员的相对稳定性等,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可

以聚在一起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同时在课程中我们加入一些意义建设以及归属感培养的社区公益活动,如为周边的建筑工地募捐衣物、到建筑工地演出、为建筑工人在寒冬送去姜汤等。这些活动需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挥大家的智慧,有分工和协作等,通过这些活动来建立大家团结、协作和参与的社区意识以及从服务别人的公益活动中,焕发生命的意义感。在关系深入的过程中,社区群众有个人困扰或者家庭问题,就开始来找工作人员倾诉,或者社区居民在一个课程中逐渐熟悉、关系加深的时候,互相之间的支持和倾诉也开始发生。当社区居民开始给我们诉说他们的困难和心里话的时候,改变的机会才被创造出来。

(二) 持续的关系建设,寻找改变的机会

上述的活动虽然可以促进大家协作和团结的行为,但离变成持久的社区意识相差甚远,也绝不是简单的事情。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共同牵在一起的利益,很难凝聚大家和培养持久的社区意识。在我们各种课程班中,只有亲子班最有可能成为培养社区意识和骨干的平台。

如前社区分析所述,社区没有任何幼儿教育机构,在社区的家长要求下,我们开办了亲子班,

台湾的高等教育普及面虽然还算广,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人没有机会上大学。更何况还有因为家境贫寒或者其他原因当年没有继续深造,如今已经人到中年的职场男女。而社会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如果没有知识,或者知识不及时更新,很难讲不会被淘汰。即使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她)也还是需要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一个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之下,社区大学应运而生。自1998年台湾的第一所社区大学——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创办以来,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到近50所,几乎是每个月都会产生一所大学,在读生超过了6万人。我们借鉴台湾社区大学的办学经验,聘请了台北芦荻社区大学的常务秘书来近邻康营社区工作两年,传授办社区大学的经验。我们称之为社区学苑而不是社区大学,主要是对农改居的社区来说,大学二字对他们望而生畏。“学苑”则更符合这个社区的特点,里面不仅学习知识更是一个文娛的平台。

《新民周刊》2012年35期。

参见杨静:《社工义工联动,整合资源》,《行在路上——变迁与发展中的社区工作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287页。在这里,总结了社区群众参与针对建筑工人关爱日活动后的感受,认为焕发了生命的意义。

从一开始的 20 多人,发展到现在一个班 40 个孩子和家长一起上课,外面有 80 多孩子在排队。亲子班一方面传授育儿的知识,另外,我们通过亲子班所创造的空间,让家长(一个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等)们可以广泛参与社区的活动或者其他课程,如家庭经验工作坊等。通过亲子班培育家长老师,组织家长老师参与管理亲子班的日常事务,培养大家团结协作的意识。进一步,再培养亲子班的家长老师成为社区工作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走到培养妈妈师资逐渐成为社区工作者的这一步。能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妈妈老师在亲子班找到了她们的价值和意义,和我们的关系从被服务对象变成合作伙伴,有了亲子班的空间和持久的关系建设,改变才有机会发生。因为亲子班建立了比较深入的关系,所以我们工作者才有机会通过家庭经验工作坊进入家庭,夫妻关系、家庭教育等问题开始有了触碰。

改变的发生,不是靠着说教,也不是活动串烧就能发生的,而是需要在细致的关系建立中,拉开关系的空间,创造机会和条件,才能看到改变的机会,改变或许才能发生。无论个人、社群和社区,都是如此。

五、思考和讨论

常规的论文结论总要给出一些证明或证伪的理论,然而作为行动研究的倡导者,我们的论文却沿着行动研究的精要,展现的只是一个过程的阶段性反思。我们不能说行动研究方法相对其他研究方法更加优越,然而行动研究却是一个扎根基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方法。在此,提出两点工作感想,与其他对行动研究推动社区发展的同行们分享。

1. 社区意识的建立,生活意义的重塑,绝不是社会组织一家的力量能够实现,需要社会各方面综合的力量。

地区发展模式的理想是好的,但在该村改居的社区来推动此模式是很困难的。对康营社区来说,建立居民之间的熟悉感很容易,然而,由于该社区仍旧保留着各村落的经济利益,也有拆迁后的利益分配不均的深刻矛盾,诸多利益的纠葛,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很难建立。生活意义的重塑更举步维艰。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的不足和缺乏,生活的不方便,居委会群众工作的不细致和粗糙,对于群众遇到的种种生活的难题居委会甚至上一级机关很难解决等。当社区群众每天都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却无法有出口的时候,他们只能回到个人去寻找生活的乐趣,不相信也不愿掺和或者投入社区公共事务。当我们通过社区活动刚刚建立一点点协作、团结感,很快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显得脆弱和无力。

2. 使用“关系、空间和机会”的行动研究,需要推动者长久地扎根于社区,与社区生活融为一体,才能产生润物细无声、悄然而深刻的改变。

这两点在当下社会难上加难。社会工作者面对高昂的生活费用和微薄薪水带来的现实生活困难;政府要迅速看见成绩,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细致关系建设的工作;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很难在一个地方持续投入;当地政府的认识出现误区,将社会组织当成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协作或者合作关系等,都让这种理念很难落地生根。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对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农改居社区工作是有益的和值得借鉴的。

(责任编辑:徐澍)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Meaningful Life: Action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Village to Urban Community

YANG Jing

Abstract: The district development model is mainly about solving problems regarding community awareness (belonging, acceptance)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ction Research provides a (下转第 37 页)

NGO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stitute : An Alternativ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ZHU Jiangang , CHEN Anna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mainstream. However , the independ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work have also been questioned. Under the intense pressure of government's purchasing services , a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could consider to become an NGO in order to be professional , and grow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logic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NGO , which might lead to an independent , autonomous and sustainable organization. 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multiple forms have been shown in the interior social work in China. Although not all of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ecoming NGOs , it could help som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to be more professional , as well as to obtain mor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 which would be of advantage for the whole field to develop healthily.

Key words: social work , NGO , independence , social participation

(上接第 14 页) method to build real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to reestablish a meaningful outlook on life. This article uses an example of a Beijing rural village transformed into an urban community to demonstrate how action research can be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ling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meaningful life. Through the set-up of a community academy , with focus on community education , by connecting through a series of classes , and by working on establishing and deepen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 community awareness was raise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as reshaped.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villages to urban communities , community work , district development model , action research , change

(上接第 27 页)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European Family Policy in Recent Twenty Years

ZHAO Fang , CHEN Yan

Abstract: In recent twenty years , families and family-related policies have been a focal point that European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Examining European family policy from typology , frame of explan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 four aspects of the changing trend can be proved (1) individualization of family policies (2) de-institutionalized traditional families ;(3)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 and (4) family policy's private and public propert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hanges in European family policy field , continuity is so deep-seated that changes have no access to the nature of family policy , which can be found from the role and the nature of family and the orientation to gender relations.

Key words: European family policy , change , continuity